本版编辑：兰文飞
E-mail：t4@studytimes.cn
Tel：010—62806237



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遵义会议

□ 李东朗

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、挽救了红军、挽救了中国革命。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的转折点，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，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点，并因此而彪炳史册。

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，使党和中央红军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，它宣告了博古、李德领导的破产。但是，博古、李德没有因此而改变错误领导。“黎平转兵”后，中央红军迅速进军，于1935年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，准备渡乌江北上黔北。这时，博古、李德再次主张前往湘西：“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，再徐图进军湘西，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。”为此，中共中央在贵州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，否定了他俩的意见，并规定：“关于作战方针，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，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。”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。严酷的现实说明，博古、李德教条主义的思维和领导能力的巨大缺陷，不仅不能突破危局、使红军摆脱危险，而且可能使红军遭受灭顶之灾，进而给中国革命造成全局性的灾难，他们已经担负不起领导全党和红军胜利前进的责任。并且惨重的失败，在红军中引发很大的不满，使他俩丧失了继续领导的威信。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就此回忆说：湘江战役后，“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‘围剿’以来，迭次失利，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，与反四次‘围剿’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，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，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，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、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。这种情绪，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，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。” 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、亲历这段长征过程的罗明也回忆说，当时“干部们对军事指挥有很多意见”。 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、猴场会议上的激烈争论和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他们的意见，就说明博古、李德的领导难以为继了。

长征出发后，为使红军争取主动、寻机发展，毛泽东、彭德怀等曾多次建言献策，但遭到博古、李德拒绝。在目睹错误领导将红军带入危局的严重情势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等不断向博古、李德的错误领导提出意见和批评。周恩来回忆说：“从湘桂黔交界处，毛主席、稼祥、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，一路开会争论。从老山界到黎平，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。”

其时，纠正错误领导、统一党内意志，以摆脱困境，是党和中央红军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当务之急。为此，黎平会议决定到适当的地区召开会议，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、总结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。

1935年1月7日，中央红军在突破乌江天险后，智取黔北重镇遵义。其时，国民党大军已被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，相对和缓的军情，给召开黎平会议决议中的会议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比较安全的环境。

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

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著名的“遵义会议”召开。与会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、红军高级将领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。

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总结报告（史称“正报告”），他在报告中强调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、党的各项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，而基本否认他和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。周恩来接着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“围剿”的军事工作报告（史称“副报告”）中，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“围剿”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，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，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。随后，张闻天根据会前和毛泽东、王稼祥讨论的意见，作批判“左”倾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（史称”反报告”），他尖锐地批评了博古、李德的“左”倾军事路线。

毛泽东接着发言，他运用事实驳斥了博古所讲的各种客观原因，认为红军具有粉碎敌人“围剿”的有利条件。并且就具体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，如对诱敌深入、集中优势兵力、运动战、游击战、战争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、保持有生力量和保卫苏区领土的关系、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的问题等，作了深刻的论述。

王稼祥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，批评了博古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，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。

朱德、李富春、聂荣臻、刘少奇、陈云、彭德怀等纷纷发言，“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”，认为博古的报告“基本上是不正确的”。

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，“不同意毛、张、王的意见”，博古“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”（凯丰、博古后来都认识了他们的错误，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），李德“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”，并辩解说他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，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。

会议最后决定：“（一）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；（二）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，委托常委审查后，发到支部中去讨论。（三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；（四）取消三人团，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，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。”会议还“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，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”。

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

遵义会议是党在危急时刻召开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非常重要的会议，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，实事求是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，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面临的重大的、关系全局的问题。

遵义会议的最大功绩，是改变了中共中央的领导。会议决定“取消三人团”，会后张闻天根据会议讨论内容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，明确指出李德和博古执行了“左”倾军事路线，对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“是要负主要责任的”。随后，中央政治局会议“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”。由此，结束了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对全党的领导。

遵义会议更为重要的是，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，开始对全党的领导。虽然其时，毛泽东没有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。但是，一方面，由于当时党最重要最急迫的工作是军事斗争，军事斗争是覆盖全党一切工作的核心工作，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，实际上就是对全党工作的领导。另一方面，党的领导人张闻天、周恩来都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，接受他的主张和建议，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成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，他的作用和影响力大大超出了他所担负的实际职务。从指导思想上讲，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决策，在党的各项决策中，他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；从影响力方面讲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，实际上处于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。因此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开始形成。对此，亲历长征历史过程的周恩来、张闻天、陈云、邓小平、杨尚昆都有明确的论述，这些基于他们亲身感受的认识，反映的是一个历史的真实。

围绕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领导地位形成的问题，有一点必须看到，就是形式和实质的问题。从形式看，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上，没有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，但从实质看，如前所述毛泽东发挥了主要的领导作用。

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，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果，对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胜利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。这是历史已经证实了的，这是遵义会议彪炳史册的主要原因。

用“五观察五看”提升干部考察工作水平



□ 郭智强

干部考察工作是选任干部的基础性环节，在整个干部工作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。在中央政治局“三严三实”专题教育民主生活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“五观察五看”重要思想，也就是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以看其见识见解，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以看其秉性情怀，观察干部对名利的态度以看其境界格局，观察干部的为人处事方式以看其道德品质，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以看其综合素质。这为我们坚持好干部“五条标准”用人导向，进一步做好考察选用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方法路径，必须深刻领会，学以致用，切实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出来、用起来，努力提升干部考察识别工作的能力和水平。

立体看人，精准识人

考察识别干部，功夫要下在平时，并注意重大关头、关键时刻，特别是要近距离接触干部，深入基层了解情况，对干部的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作出考察，掌握最真实的情况。

更加注重对干部见识见解的考察。在重大问题面前往往能够体现领导干部的是非观念、党性原则和立场态度，这是干部考察的首要任务。具体要看一个干部在坚持党的理论方针政策、在贯彻中央重大决策部署、在从严治党管党等方面，是否把牢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是否做到理想信念坚定不移、言行举止内外统一、作风做派扎实务实，坚决把好干部选任的政治关。

更加注重对干部秉性情怀的考察。干部称职不称职，群众说了算。具体要看一个干部在工作中能否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办，能否把群众满意不满意、答应不答应、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工作的衡量标准，尤其要在精准扶贫、城市管理、民生保障等方面考察干部的民生情怀和宗旨意识，坚决把好干部选任的群众路线关。

更加注重对干部境界格局的考察。名和利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如何正确对待，是观察干部境界格局的“风向标”。具体要看一个干部是不是能够坚持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是不是坚持正确的事业观、群众观、利益观，是不是自觉做到了吃苦在前、享受在后，坦然面对名利，淡然面对得失，不忘初心，固本培元，坚决把好干部选任的价值追求关。

更加注重对干部道德品质的考察。道德品质是干部的做人之本、立身之魂。具体要看一个干部的政治品德，是否做到在党爱党、在党言党、在党护党、在党忧党；看职业道德，是否有强烈的责任担当和使命精神；看家庭美德，是否做到洁身自好、孝老爱亲；看社会公德，是否做到遵纪守法、宽容和谐，自觉传播正能量，坚决把好干部选任的党性修养关。

更加注重对干部能力水平的考察。坚持把敢于担当、敢于碰硬作为干部选用的重要标准。具体要看是否认真负责、担当作为，是否经受过繁重任务、复杂局面的考验，是否有促改革、谋发展的工作实绩，是否具备胜任岗位、履职尽责的能力素质，坚决把好干部选任的能力实绩关。

改进方式，力求客观公正

改进考核方法手段，多渠道、多层次、多侧面深入了解，用好“放大镜”，突出“望远镜”，注重“显微镜”，推动干部考察工作由提拔前考察向日常中考察延伸转变。

夯实“一个基础”。坚持把做实考察准备工作作为提升考察质量的基础，依据不同层面和不同类型，合理设置考察指标，确定谈话要点，着力提升干部考察的针对性、实效性，比如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（党组）书记的考察，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；对贫困县乡党政负责同志的考察，要提高减贫、民生、生态方面指标的权重，真正做到知事识人，用当其时。

坚持“两个结合”。一方面，把平时“考核评价”与“任前考察”相结合，探索推行“无任用推荐考察”工作模式，更加注重在平时考核、年度考核、专项考核、调研督查中掌握班子运行、干部表现情况。另一方面，坚持“扩大民主”与“把关定向”相结合，增加基层干部群众参与考察工作的知情权、评价权，提升考察的质量和实效，努力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，尤其是要充分发挥纪检信访部门的作用，征求党组织、班子成员、分管领导的意见建议，对考察对象作出客观评价。

注重“三个拓展”。重点是要延伸干部考察触角，尽最大可能全面、客观、准确地了解掌握干部各方面情况。一是将干部考察向“听不同声音”拓展，借助平时考核、调研督查、参加民主生活会等非考察形式，听“弦外之音”，拓宽了解干部的渠道；二是将干部考察向“社交网络”拓展，把干部“还原”到社会关系当中，延伸到考察对象的“工作圈”“亲属圈”“朋友圈”“生活圈”，了解考察对象爱岗敬业、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等情况；三是将干部考察向“精细深入”拓展，改变干部考察谈话过于宏观，只谈面上不谈点上的不足，引导干部通过举事例的方式印证其对考察对象的评价，避免出现简单化、公式化、空泛化现象，进一步增强对考察对象的深层次认识。

完善制度，健全保障机制

干部考察工作的政策性、纪律性很强，必须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总结，深入研究，努力形成系统完备、科学规范、有效管用、简便易行的干部考察制度机制。重点围绕“选出好干部”这个根本目标建立落实三项制度。

健全完善日常管理制度。围绕干部平时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表现，制定完善工作台账，形成完备的考察记录，进一步充实干部成长的档案资料，避免“一次考察定任用”可能带来的影响。及时掌握干部在遵纪守法、信访维稳、政法综治、环境保护、民生保障、群众信访举报等领域出现的“负面信息”，为党组织做好干部选任提供准确、全面、详实的依据，坚决防止因考察工作不到位导致用人失察、“带病提拔”等问题的发生。

健全完善协调联动制度。加强与纪检机关、法检两院以及组织、政法、统战、公安、信访、审计等部门的联席沟通，主动征求相关部门对被考察干部的意见和建议，并由考察责任部门综合考察对象在岗位匹配度、工作适任度、班子融合度、组织信任度、群众满意度等方面的情况作出具体评价，特别要坚持从事业需要、工作需要出发，认真分析不同岗位的具体特点、工作要求和任职条件，该用什么人就用什么人，什么人合适就用什么人，做到人岗相适、人事相宜，实现考察工作水平整体提升。

健全完善责任追究制度。坚持把干部考察工作作为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，把压力分解传导给各级党组织书记和组织部门负责人，自觉做到对干部考察工作重大问题及时研究，对具体考察细节和程序把关定向，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。按照“谁考察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考察工作责任，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实行“零容忍”，加大责任追究力度，既查处当事人，又追究责任人，一查到底、问责到人，努力为干部考察工作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。同时，要把干部考察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，通过考察激发干部活力，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进步，实现干部考察与推进工作“两不误、两促进”，努力为推动转型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。

参考与建议

改进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

□ 郑寰

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必须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（以下简称“直联制度”）。这既是把作风建设抓常、抓细、抓长的必然要求，也是新时期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举措。

根据调查研究，要进一步推动直联工作，有以下重点问题亟待破解。

对直联制度进行准确定位。直联干部是“教练员”与“辅导员”，不能包办和代替基层干部的工作。实践证明，直联一旦过度干预基层干部，不仅不会加强党的基层基础工作，反而会削弱基层干部在群众心中的威信。直联的目标，是要以村支部、社区党支部为基础，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核心，强化基层干部在当地的群众基础，把他们的威信牢牢树立起来。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，莫让直联干部的“全能”变为基层干部的“无能”，给群众留下基层干部不管事的印象。

处理好直联制与基层自治的关系。直联工作要善于发动群众、动员群众，带动群众共同参与。不能狭隘地将其理解成“拉资源”“找关系”，不能以“搞项目”“招商引资”代替人民群众自主能力的培养。避免直联帮扶越多、资金匹配越多，反而群众愈加不满的悖论。

处理好“党政想干”和“群众想要”的关系。党员干部深入群众不仅要与群众打成一片，更要注重倾听群众的诉求，畅通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，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。尤其要善于向群众学习，推动政策创新和调整。直联不能仅仅停留于村居，还要向上延伸，促成更广泛的政治对话，与协商民主、参与民主等机制有效对接，推动中央部委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在制定出台政策过程中，充分听取和吸纳基层的意见，形成良性的上下沟通渠道，建立调查研究的制度，少一些“关门决策”，形成群众参与决策的有效渠道。

注重以直联推动政府职能转变。直联要瞄准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，找办法理顺体制机制，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改革。将权力下放基层，资源下沉基层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，推动镇乡和街道的综合转型升级。否则，直联可能走形变味，反而造成基层负担加重，导致末梢淤塞梗阻。

善于构筑群众工作同心圆。当前，各地直联制度的主体主要是在职党员干部，大多数普通非在职党员、退休党员、入党积极分子，甚至一些亲党的后援群体都没有纳入直联共同体。直联制要克服官僚化，活化党的细胞，就需要突破干部身份、党员身份的无形壁垒，推动全体党员都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，推动全体热心人士共同服务基层。联系群众的主体要从党员领导干部、普通党员干部进一步扩展到全体党员，构筑群众工作的“同心圆”。充分发挥党代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主渠道作用，在基层深入推动党代会常任制，拓宽党代表联系群众的渠道，创新发挥党代表工作室的作用。

用互联网思维来做直联工作。在收集社情民意时，构建群众需求的大数据、党员干部的大数据、提供更加专业化、精准化的服务，有效地把握群众情绪，全面了解群众需求，及时掌握社会的“爆点燃点”、提前进行风险预判。推动电子政务深化发展，统筹政府和社会数据资源，打通不同部门之间的壁垒，让“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”，减轻基层干部的繁重负担。重视网民的意见和建议，打通联系网民的渠道，让干部网上听民意，网下解民忧，善于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宣传党的政策和方针。通过新技术的运用，全面推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供给侧改革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、个性化、差异化需求。

党建科学化